

文化的结构、发展和演化 (三) 和方略

CULTURE



董光璧

董光璧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4. 大文化战略之路线图

这里所谓“大文化战略”指的是复兴中华的战略，一个以创新人类文明为目标战略。它以千年的世界历史为背景，以三个世纪的中国历史确定预期目标。通过 184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一百年奋斗中国获得了世界政治五强之一的地位。通过 1940 年代到 2040 年代的一百年奋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五强之一已是无疑。为 2140 年的中国成为世界科学强国，就必须有一种为世界科学的发展作贡献的精神。

4.1. 确立创新文明目标

我们为什么要创新文明？因为工业文明不可持续，因为中华民族要为人做贡献。

当代文明的危机，生存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科学与人文发展的不平衡，是工业文明的危机。现有的科学技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工业文明自身已不能挽救其面临的危机。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注定其走向衰落并且必须尽早终结。正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一样，必须有

新的文明取代工业文明。要走出工业文明的危机，要终结工业文明的时代，要创造新的人类文明。

自鸦片战争败北以来的中华民族，长期挣扎在存亡继绝的精神压抑状态下，现在应该有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了。一个民族的国际地位决定于它对于人类事务所做出的贡献，对人类进步贡献微不足道的民族是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曾经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为人类做出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而在创造和发展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则贡献甚少。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在于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在创造未来的新文明中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不应是“克隆”工业文明，而应是创造新文明。

我们有何条件创新文明？我们有优秀的母本文化，我们遇到了时代转折的机遇。

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社会的主要冲突是工商文化对农耕文化的进犯。依据文化融合说和工业文明生成的历史经验，未来新文明将在

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农耕文化的典型，它应该作为在创造知业文明的过程中与工商文化并存竞争的文化因素加以关注。但百余年来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理论尝试，似乎都没有以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的融合作为出发点，这或许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国有世界最优秀的农耕文化传统，它应该作为创造未来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应作为世界稀有的战略资源加以珍惜和运用。

当代世界正处在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当代科学正在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科学，当代文化也正在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文化。人类社会的中轴正在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转换。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科学将作为“社会中轴”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文化的科学不仅在塑造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完善人类的理性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还通过为人类行为符合规律性提供基础而规范人

类的一切行为。

我们该如何创新文明？争取恪守自由，重新发现真理。

爱因斯坦认为，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恪守内在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外在的自由，社会人的权利，由法律保障的自由。内在的自由，自然人的精神状态，人作为的最高品格。从严复的译著《群己权界论》（1903年）算起，自由思想被引进中国已经百余年了，而国家决策层对待自由的态度仍然是“欲迎还拒”。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说：“事物的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像家为之工作的哪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被我们遗忘掉。”世界文化正在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的文化，任何文化传统都面临能不能被科学论证的考验。中华民族要实现文化的推陈出新，就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个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古代贤哲的思想中保存有“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它的发展将为科学的未来开辟道路。如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新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提供我们文明中的最佳遗惠，以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科学知识系统和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当是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

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与中国科学传统契合的科学新类型正在形成，与传统理解的科学相比未来的新科学可能有四个极为重要的观念特征。第一，传统理解的科学主张科学只是揭示那些能由任何科学探索者重复的知识，而科学的新类型把不可再现的行为视为科学探索的重要对象。第二，传统

理解的科学把科学的社会运用问题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而科学的新类型则把它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第三，传统理解的科学忽视价值因素，而科学的新类型则必须考虑价值因素，因而使科学理性除了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以外又增加了价值理性。第四，传统理解的科学知识系统是不关涉其自身的，而科学的新类型的知识系统则要求有这种自反性。

现在正在讨论的国家创新系统问题，应在创造未来新文明这样的大框架下思考。熊比特赋予创新以“创造性的毁灭”的思想，按照中国文化传统可以理解为“革故鼎新”、“除旧布新”和“破旧立新”，可以使之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讨论可与人类文明的“创新”联系起来，即以人类文明的进步为背景讨论国家创新系统问题。

4.2. 整合发展普世价值

认识普世价值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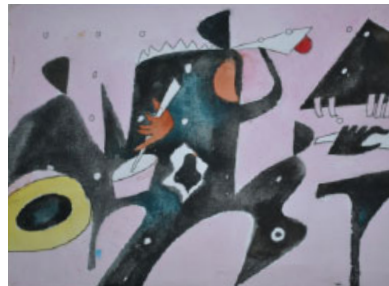
“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指全人类认同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理想的追求，从大同世界的“天下为公”到工业文明时代的“自由世界”。近500年来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全球化的整体发展，“普世价值”正在成为不同民族和种族、不同文化和信仰、不同国籍和地域的人们和谐共处的核心价值。

普世价值是“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价值”，而非所有人正在相信，更不是所有人都在践履的价值。英国哲学家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说：“普世价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实际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Democracy as Universal value, 1999）中说，“当甘地认为非暴

力是普世价值时，他主张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并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

普世价值不是先验的也不是人的理性设计的，而是在经验中自组织形成的，能够被人类历史最终肯定的价值。当今所论的普世价值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指的是启蒙理性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民主和科学等进步理念。它们写进了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89年），也为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所接受。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报纸检查令》（1842年）就是论新闻自由的，他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848）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自由人的大联合”。

从《联合国人权宣言》（1948年）到《走向全球伦理宣言》（1993年）从“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成立（2000年）到“民主国家协约”构想，普世价值的世界超流汹涌澎湃。孙中山（1866—1925）曾经告诫我们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尽管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尚在争论，对于科学的国际性和超民族性却没有疑义，科学文化所凝聚的人类的普遍追求，所积淀的人类的共同精神，作为人类历史的最伟大的趋同力，无疑应归属于普世价值。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人类文明在欧亚大陆两端独立发展起来，在大约一千年前，东端的中

华文明发展到顶峰而开始衰败，西端的欧洲文明则通过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逐渐发展出工业文明。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四五百里，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碰撞。

第一次大碰撞的表现形式是“西学东渐”。从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登上中国领土以后的150多年间，传教士们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传教手段的“科学传教”，使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到来自欧洲科学知识。徐光启（1562—1633）提出“中西会通”以求超胜的主张。当骄傲的耶稣会士以其“欧洲文化中心论”向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传授西学时，中国儒士阶层出于民族自尊感，以其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中心论”的文化观对抗外来文化。在西学且主要是西方历算明显胜于中法的形势下，儒士们为不失体面竟编造“西学中源”，它由于康熙皇帝的钦定而广为流传并贻害一些走向以经学治科学的错误方向。

第二次大碰撞的表现形式是洋务运动。在殖民者的炮舰威逼下被迫开放了国门，伴随着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世界化的科学技术第一次被有计划地大量引进中国。在科学本身的范围内已无力抵抗的形势下，转而求助于中国特有的体用观来贬低西学，提出“中体西用”，由于管学大臣孙家鼐（1827—1909）和张之洞（1837—1909）的引用而成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洋务运动由于甲午战争的考验而以失败告终，于是有戊戌变法（1898年）和辛亥革命（1912年）相继发生，中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面进入了制度层面。在巩固革命的新旧更迭乱象中，一些知识分子转向思考政治腐败的根源，开辟了“新文化运动”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新领域。

以胡适（1891—1962）和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或“人权与科学”）为旗帜，

它本质上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启蒙运动。这认同西方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激起了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故运动出来对峙。

1935年1月在《文化建设》发表的萨孟武（1897—1984）等十教授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反对全盘西化而主张“吸收其所当吸收”。被胡适批评为“今日之一般反动空气的最时髦的表现”。2004（甲申）年9月许嘉璐（1937—）等署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以文明多样性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宣称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有权自主决定。被余英时批评为，与清末的“中体西用”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精神系脉相通。

第三大碰撞的表现形式是改革开放，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自己敞开国门。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和安徽小岗村农民的秘密协议，几乎同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政治自由化被否定，经济自由化被肯定。受农民经济自由化的启发，经济特区诞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有企业改制。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混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土地剪刀差，权力资本化，扩大私有财产范围和自由市场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流行。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对普世价值的认可。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关于普世价值的大论战之中。

发扬文化自觉传统

梁漱溟的文化三分类说

梁漱溟（1893—1988）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视文化为调解人类意欲与环境冲突的手段。他把文化区分为三种理想的类型，分别由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作为第一阶段的西方文化，

适应于人类自然生存尚未解决的历史阶段，意欲奋进征服环境。接下去的第二阶段是意欲自安的阶段，而第三阶段则是意欲反身后求的阶段。其结论是：中国文化在今日之失败并不是中国文化不好，而是不合时宜。梁漱溟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语言和阳明哲学的精神勾画出中国文化的伦理完美。他认为中国文化属于第二阶段的文化，印度文化则属于第三阶段的文化。

冯友兰的精神四境界说

冯友兰（1895—1990）他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提出人类精神四境界说（1943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对对自己的行为不甚自觉的精神状态，功利境界是自觉的利己主义的精神状态，道德境界是自觉作为社会一员的精神状态，天地境界则是自觉作为宇宙一员的精神状态。这天地境界的超越道德的价值，是一种即超越自我又超越客观的精神状态。

牟宗三等新儒家的期望

1949年元旦，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张君勱（1887—1969）、唐君毅（1909—1978）四人联名，在香港《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吁请西方人学习东方文化以为人类未来开辟一条新路。他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其前途之展望，是他们反省中国文化之历史和价值、探讨中国文化之未来十年努力的总结。

胡适的无畏和信心

胡适（1891—1962）在1960年7月11日西雅图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中华传统及其将来》。下面的两段话出自胡适的这篇演讲。“对于这些文化方面的伤亡，我们不必难过，它们的废除或解体，应该视

为中国从它孤立的文明枷锁中得到解放。”“新文化成分在接受，正可以使旧文化内容丰饶，增加活力，我永远不畏惧中国文明于大量废弃本身事物及大量接受外国事物后，会发生变体或趋于灭亡的危险。”

费孝通(1910—2005)的“文化自觉”

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自觉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后来他又把“文化自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自觉”相提并论，

4.3. 把握周期汇合机遇

在20世纪先后发现了经济、科学和政治的发展周期，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几乎同时进入新的周期。尽管这些周期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准周期，不像地球绕太阳等各种自然界周期那样严格，但慢变化制约快变化的控制论原理还是允许我们通过历史的外推而对未来做出某种展望。

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的发现始于19世纪中叶，1826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lément Juglar, 1819—1905)发现约十年左右的周期。进入20世纪之后，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基欣(Joseph Kitchen, 1861—1932)1923年发现约三年左右的周期，1925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 1892—1938)发现约五十年的周期。现在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三中周期，即基欣短周期、

朱格拉中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奥地利-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通过对基欣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综合分析，在其《经济发展理论》(1939年)中发展出技术创新周期论。按照熊彼特理论审视资本经济发展史，经济长波与技术创新的对应关系分别为：第一长波期：1770—1830年，蒸汽化；第二长波期：1830—1880年，铁路化；第三长波期：1880—1930年，电气化；第四长波期：1930—1990年，电子化；第五长波期：1990—2040年，数字化。

科学周期

科学周期的发基于科学地理中心问题的研究，英国社会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在其著作《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 1954)中列出了古今18个时期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Mintomo Yuasa, 1909—2005)对几代以来的科学中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来自科技成果编年表等文献1501年至1950年的数据统计，在1962年提出了80年左右的科学中心转移周期。所谓的科学中心指科学成果数占世界总成果25%的那些国家。经由赵红州(1942—1997)和蒋志(1939—)等人的发展，科学周期包括10年、80年和600年甚至5000年等不同的周期。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科学经历了六个80年的周期，各周期相应的高峰分别为16世纪80年代、17世纪60年代、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它们大体分别对应于意大利、英国连续两次、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新的第七科学周期的高峰预计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

政治周期

政治周期的研究结果出现在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包括美国政治学家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 1926—)的“领导长周期论”(1978年)、美国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Robert Gilpin, 1930—)的“霸权稳定论”(1981年)和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的“霸权周期论”(1983年)。按照这些周期研究，环球航海以来的国际政治经历了五个百年左右的霸权周期，即葡萄牙霸权期(1495—1580年)、荷兰霸权期(1580—1688年)、连续两次的英国霸权期(1688—1792年, 1792—1914年)



和美国霸权期(1914—2001年)。我们中华民族对于政治霸权的直接感受是：葡萄牙借居澳门(1553年)、荷兰强占台湾(1624—1662)、英国强割香港(1841年)、美国阻挠台湾和大陆的统一(1949年)。

美国可能再度成为世界霸主，作为国际政治、全球经济和世界科学的中心，领导21世纪的世界潮流。按照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主宰国际政治的国家要拥有维持全球秩序所需资源的1/2；左右全球经济的国家要掌握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技术群；堪称世界科学中心的国家要贡献科学发现总量的1/4。当今世界只有美国有这样的综合国力，任何其它国家都不足以挑战其领导地位。

我们中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50年限期，恰遇第五世界经济长波、第六国际政治霸权和第七科学地理中心转移三大文化周期的汇合。对于意欲振兴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既是一种严肃的挑战，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积极发展信息经济，准备霸权竞争的挑战，积累发展新科学的基础，走稳复兴中华的这一步。G

(完)